



论 政 治

——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

胡 伟 唐贤兴 著



LUN ZHENGZHI

ZHONGGUO

FAZHANDE

ZHENGZHIXUE SIKAO



论政治

——中国

发展的政治学思考

胡 伟 唐贤兴 著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胡伟 唐贤兴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2

ISBN 7-210-1710-0

1. 论……

2. 胡……

3. 政治理论,政治学,学术著作--政治

4. D0

论政治

——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

胡伟 唐贤兴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12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2

字数:250千 印数 1001-2000册

ISBN 7-210-01710-0/D · 245 定价:22.8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0791)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论

一个古老而又鲜活的命题

2300多年前，一位年轻的斯塔吉拉人在地中海沿岸崭露头角，他就是古希腊成就辉煌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后人曾把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成就称作是“亚里士多德奇观”，组成这个奇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他的一部名著——《政治学》。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命题：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氏这句话也可被解释为人类是自然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因为，在古希腊，政治生活就是指城邦生活。在亚氏看来，人类之所以在本性上就是政治动物，是因

为在自然界中只有人类具有理智,能够区分善与恶、正义与不义,而城邦的形成则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其目的是为了人的“优良的生活”,城邦本质上就是至善的社会团体,“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①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命题并没有超出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制约,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但它揭示了人类同政治自古以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蕴含了这样一层深刻的含义: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为只有人,才有能力追求一种以善和正义为目的的优良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命题受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予以引用和评论。马克思指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②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论出发,揭示出政治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更为严密地说,人最初只是一种社会动物而非政治动物。但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现象产生以后,即阶级社会中人与政治的关系是极为重视的。如果说不能一概而论地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话,那么至少在阶级社会中,人就的确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正像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③

“人是政治动物”作为一个古老的命题,在当代社会依然得到了广泛的反响。法国宗教思想家马里坦解释道:“人是一个政治动物,这意味着人企望过政治的生活、社会的生活,不仅关于家庭的生活,而且关于公民社会的生活。”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页、13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页。

的一部代表作的书名就叫《政治人》，该书开卷第一句话便是亚氏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如同马克思一样，确信人首先是一种社会动物，但他认定在较不严格的意义上，人们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说人是政治动物，“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麼，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事实”。^① 中国政治学家王沪宁也指出：“今天的事实是：不论是五大洲哪一块地方，不论是世界上哪一个种族的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生来就不能跳出历史为他所创造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和历史为他准备的政治共同体。这一个现实告诉人们，在政治时代，政治每时每刻都在人类身边。为了更好地生存，人类必须创造更好的政治。要创造更好的政治，人类必须对政治有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② 总之，从古到今，“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思想，人类时时刻刻都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昭示人们，自文明社会以来，人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而且政治现象成为人类社会特殊性的最重要标志，因为只有人类才能过政治的生活，并享受不断更新和改善的政治生活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诚然，不良的政治活动也曾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但不难想象，如果人类脱离政治生活，像野兽那样弱肉强食、自生自灭，其后果将是什么？人类是否还会有现在的文明？更何况，在现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人类也不可能摆脱政治，因为正像列宁所指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经济基础离不开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这正是“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潜在含义。因此，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不是如何排斥政治和回避政治，而是如何不断改进人的政治生活使之更好地为人类的幸福服

①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9页。

②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务。排斥和回避政治的结果不是真的能够摆脱政治,而是放弃了对政治生活的改善,使不良的政治给人们造成比以往更大的灾难。

“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昭示人们,努力改善政治生活是人类必须不懈追求的基本目标。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国》、莫尔的《乌托邦》,到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再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雅典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国,到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和普选制,再到巴黎公社、苏维埃制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数千年来,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在探索通过良好的政治造福于人类社会,广大社会民众也为追求更美好的政治生活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政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虽然它们尚未完全变成人类政治生活的现实。

“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也昭示我们,社会主义更需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完善的政治生活,因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人类社会形态。正像邓小平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①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特别注意从政治上看问题,特别注意处理好政治问题,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毛泽东早就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邓小平也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在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又着重指出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就赋予关于政治的这个古老话题以鲜活的现实含义和时代气息。

然而,尽管亘古至今人们都与政治难解难分,而且人类也清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地意识到自己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但究竟什么是政治，数千年来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最高的善，而在马基雅弗利看来政治不过是阴谋诡计；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一些西方学者却相信政治是为了普遍的公共福利；传统政治学把政治主要局限为国家现象，而多元主义则争辩说政治存在于非国家、非政府的社会团体之中，政治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而且，对政治内涵理解的不同，又关联到对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集团、民族、意识形态、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和人类世界等一系列问题的不同看法。于是围绕着什么是政治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是越来越简单明了，而是越来越纷纭复杂，给人们理解政治造成了困难。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人长期以来对于政治的概念也缺少系统完整的理论建构。英国历史学家莫尔斯·斯蒂芬斯早在1896年曾撰文指出，他找不到任何人能确切地告诉他政治或政治学是什么。阿尔伯特·索米特和约瑟夫·坦纳豪斯在分析本世纪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历史时指出，政治科学的内容从来没有明确过，这经常使得观察者迷惑不清。所以，当代一位西方学者在一本政治学的著作中写道：“我们大多数人在使用政治一词时并不提出关于政治的明确定义。”^①

当然，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花费笔墨去弄清政治究竟是什么，因为人们虽然拿不出关于政治的确切定义，但一般人依然能够无师自通地大致明白政治是什么。所以不要纠缠于理论问题，就由它去吧，我们照样干我们的事。果然如此吗？这种实

^① 艾伦·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用主义的看法实际上是似是而非、不足为训的。一方面,从理论学术的意义上讲,没有一个科学的政治概念的建构,就很难形成一门真正的政治科学。所以 A. C. 艾萨克指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与会者很少首先作出一个可供大家接受的‘政治’定义。这或许意味着人们对这一术语存在着某种基本的共同的理解。但是,在这点上,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用更为精确的方式研究政治的人指出,为了真正获得关于政治的知识,必须提出一个更为明晰的定义。也就是说,人们不能仅只依赖于共同的意识。”著名政治学家 E. E. 沙茨内德说得更尖锐:有些学者认为政治定义是不必要的,这个想法简直有些奇怪。如果一门学科没有定义,那么它必然导致学科缺乏研究重心,因为很难看清楚未被定义的事情。不能限定研究对象的人就不会知道他们想致力于研究什么,倘若不知道自己研究什么,他们又怎么能够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呢?①因此,沙茨内德把美国的政治科学称为“围绕真空的资料堆积”。在中国,应当说我们的政治学的研究比较薄弱。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很重视政治,但我们对政治所作的研究与对政治的这种重视比较起来实在是相形见绌。一个特别反常的现象是,在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政治学却被作为所谓“伪科学”打入冷宫。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②政治学研究才逐渐在中国恢复起来。这些年来,我们对于政治的研究补了不少课,但关于政治概念的科学建构以及政治理论的研究,还需要作更为细致和艰苦的努力。

另一方面,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

① E. E. 沙茨内德:《两亿美国人在研究一个政府》,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1969年英文版,第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讲政治。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讲政治,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①这就给广大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个极为鲜活的课题和十分现实的任务。比如,讲政治究竟讲什么?是讲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还是讲像马基雅弗利所说的权术?是讲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是讲经济建设政治?如果是讲经济建设政治,那么讲政治与讲经济又有什么区别?又比如,有人说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讲政治实际就是讲经济。如果是这样,那么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讲政治有什么意义和新意?如果对政治的含义搞不清楚,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回答,讲政治也就讲不到点子上。同时,时代的发展也为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是政治动物”既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鲜活的命题,因为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将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活生生的时代含义和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我们对政治现象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与阐述。特别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

① 江泽民:《关于讲政治》,载《求是》,1996年,第13期。

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但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这门课就没有补好。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理论上坚定,政治上才能坚定。革命年代如此,建设时期也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对政治进行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对政治进行研究,当前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提出“讲政治”也需要我们对政治进行研究。时代呼唤我们对政治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政治概念的真谛,发现政治运动的规律,把握政治发展的逻辑。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的政治研究还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有关政治的含义尚有待进一步辨明;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左”的干扰,人们对政治往往抱有偏见,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害怕政治、厌恶政治,一讲政治,就认为是“左”的东西。如果不把政治的科学内涵讲清楚,目前我们“讲政治”就不能落到实处,也难深入持久,甚至会失之偏颇。因此,政治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政治有一个科学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树立起全面正确的政治观,同时要使人们感到,政治理论与自己贴得很近很近,不仅需要学,而且必须学好。

我们写《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在前人对于政治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归纳和构筑政治理论的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框架,尤其是试图比较全面、系统地归纳、整理古今中外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政治学者关于政治的基本观念和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政治概念进行理论建构,使人们对政治的认识进入一个更全面和科学的层次。当然,给政治概念作出完整

的界定的确是很难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政治,至少可以从政治的一般含义、无产阶级政治的既一般又特殊的含义、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特殊含义这三个层面加以思考。我们也只是主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针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提出一些看法。所以我们把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对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本书上篇着重于政治概念的理论建构,提出政治的一般含义和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的特殊含义,形成关于政治的系统性观念;下篇着重于用上篇所建构的一般理论分析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政治问题,以及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这本书虽然不能说对前面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了全部的答案,而且其中由于包含许多带有探索性的研究,难免存在不成熟甚至不正确的地方,但我们相信还是可以帮助人们对各种政治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同时,它也是回答我们时代对于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和挑战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我们有理论上的勇气来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漫长征程中,让我们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为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腾飞,插上理论的翅膀吧!

第一輯

政治的观念：从孔子和苏格拉底谈起

“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都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人们对现实政治也并不陌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厌恶不厌恶，恐惧不恐惧，政治总要同你打交道，任何一个人或多或少都难免置身于政治之中。难怪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 2300 多年前就得出结论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令人困惑的是，虽然一谈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或许是因为对于越熟悉的事物，人们越乐于各抒己见，于是

就越难达成一种普遍一致的看法。从古至今,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治学者都试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对政治的理解,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斑驳陆离的,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政治观念。这些观念,有典籍流传的,可追溯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下面就从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开始,浏览一下古今中外一些主要的政治观念,这对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握和理解政治是大有裨益的。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伦理政治观

在远古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维十分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其中最影响的当属儒家。孔子把政治寓于伦理之中,他对政治的界定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①这里的“正”,是对统治者道德品质的要求。孔子相信,只有在政治上讲求伦理道德,国家才能得到良好的治理,正像他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因此,孔子强调要“施仁政于民”,“为政以德”,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提出了“德治仁政”和“礼治”的思想。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加强政治人物的个人道德修养,“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承袭了孔子的伦理政治观,并对“仁政”思想加以发扬光大,进一步提出了“行仁政而王”,“仁则王,不仁则辱”,“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等观点,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儒家经典《大学》对孔子的“政者,正也”的观念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发挥,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认为治国要抓根本,其根本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人们天赋的道德;所谓“亲民”,就是亲爱百姓;所谓“止于

① 《论语·颜渊》。

至善”，就是要使人们的道德品质永远保持完美无缺的境界。概言之，就是笃信道德的完善是治国的要义，因此“修身”被视为“内圣外王”之治国八目的核心。这套伦理政治观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以及朱熹等人的阐发，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

与中国的孔孟之道相似，古代西方的政治理念也与伦理观念水乳交融。古希腊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及其继承人柏拉图确信美德即知识，反之亦然，知识即美德。他们都表现出对伦理问题的首要关怀，重灵魂而轻肉体。苏格拉底毕生都在研究使有美德和才能的人当政的问题，而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的主题就在于讨论完善的人和完善的政治生活，其副标题即为“国家或正义论”，把国家与正义等量齐观。柏拉图把品德看作政治的基础，认为腐败的政治根源在于人品的堕落，要建立理想的国家，就要保持公民完美的品性而不使其堕落。而法律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威力。如同孔子一样，柏拉图对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他看来，要达到“正义”的目标，关键是政治家要知道“善”，所以国家必须由哲学家治理，因为哲学家拥有知识和智慧，因而具有美德，是“真正完善的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①——这就是影响人类数千年的“哲学王”思想。亚里士多德虽然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非凡睿智与先师柏拉图的“理想国”告别，但伦理政治观在他那里仍依然如故。亚里士多德写道：“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

①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4—215页。

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①他和柏拉图一样,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公民联合起来以求道德价值的实现,其精神与儒家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原则如出一辙,虽然古希腊与中国古代赋予道德价值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另外,与强调对德行的追求相联系,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非常重视教育,这一点也颇似中国古代的“格物致知”的“修、齐、治、平”大道,或者说是伦理政治观的共同特点。只是,伦理政治观在西方世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在中国却长盛不衰,至今对现实政治生活仍有一定的影响。

伦理政治观带有比较明显的理想色彩。虽然孔子、孟子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出于善良的愿望,把政治视为旨在实现正义和至善,倡导要重美德、施仁政,但在历史上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政治非但没有能够实现正义或达成仁政,反而充满了残暴与血腥,以致孔子在世的时候就哀叹道:“苛政猛于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政治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篇作品借“狂人”之口深刻地揭露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打着施仁政的旗号,实际上实行的是严刑峻法,鱼肉人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阳儒阴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现实的政治。岂止中国如此,西方的历史也充斥了霸道而不是王道。苏格拉底生前力图宣扬他的贤人治国的政治观,他常问青年人如果修鞋找谁,回答自然是找鞋匠,接着他又提及木匠、铜匠等等,最后便问:“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由于他总是向青年人灌输贤人治国的思想,他与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8页。